论《鹰溪桥上》的隐性叙事进程

龙玉容

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5年2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5年4月4日; 发布日期: 2025年4月16日

摘要

从亚里士多德以来, 学术界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一直聚焦于情节发展, 然而, 申丹发现, 在不少的虚构作品中, 在情节发展的背后, 还存在一股叙事暗流, 与情节相互补充或相互颠覆, 表达丰富的主题意义、塑造出更丰富的人物形象。美国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的著名短篇小说《鹰溪桥上》情节明朗, 围绕着主人公佩顿·法可尔被处于行刑时出现的逃跑幻觉而展开的, 展现了现实的残酷性。然而, 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自然景物虽然看似与情节发展无关紧要, 却暗指了含着美国超验主义为核心的隐性叙事进程。文章运用双重叙事进程理论分析《鹰溪桥上》这篇作品情节发展背后的隐性进程, 揭示比尔斯在特殊时代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关键词

安布罗斯·比尔斯, 《鹰溪桥上》, 隐性进程, 超验主义

On the Implicit Narrative Process of the *Eagle Creek Bridge*

Yurong L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Feb. 11th, 2025; accepted: Apr. 4th, 2025; published: Apr. 16th, 2025

Abstract

Since Aristotle, academic study of literature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plot, however, shen Dan found that in many works of fiction,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there is a narrative undercurrent, complement or subvert the plot, express the theme of rich meaning, create more rich characters. The American writer Ambrose Beers' famous short story "On the *Eagle Creek Bridge*" clear plot revolves around the escape illusion of the hero Payton Facker in execution, showing the cruelty of reality. However, although the frequent natural scenes in the novel seem not to be related to the plot development,

they allusion to the implicit narrative process with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as the core. This paper uses the theory of dual narrative process to analyze the hidden process behind the plot development of the *Eagle Creek Bridge*, and reveals Beers' thinking on the fate of mankind in the special era.

Keywords

Ambrose Beers, *Eagle Creek Bridge*, Implicit Process, Transcendentalism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 1842~1914)美国短篇小说家, 恐怖和灵异大师, 他一生共写了 93 篇小说, 分为三大类: 恐怖小说、战争小说、荒诞小说[1]。《鹰溪桥上》(“An Occurrence at the Owl Bridge”)隶属于战争小说, 同时, 这部小说在比尔斯战争小说中也是最受欢迎的, 备受关注和研究。比尔斯在战争中的经历, 让其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及对人类造成的伤害, 尤其是心灵方面的伤害, 这些经历成为比尔斯战争小说的写作题材和灵感的来源[2]。《鹰溪桥上》情节围绕着佩顿·法可尔因破坏铁路被处于绞刑时,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法可尔幻想的逃跑之旅。

小说自问世以来, 得到了部分批评家的关注, 国内对其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技巧分析, 主题分析和综述分析。如甘建刚(1992)讨论到了比尔斯的战争主题, 把战争看作“无休无止, 毫无意义的滥杀”, 战争一方面是使罪恶得到应有的惩罚, 同时又是对道义秩序的践踏和人性的扭曲, 这正是比尔斯作品中反战的情绪核心, 对战争的矛盾心理使其作品的主题得到深化[2]。李公昭(1998)探讨到了比尔斯战争小说的主题, 认为战争不仅残酷且荒诞, 毫无理性可言, 对比尔斯来说, 战争是一场幻灭的戏剧, 是人生最大悲剧, 造成了人性的扭曲, 进而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3]。同李公昭相似, 王延娥、陈海蛟(2012)也研究到了比尔斯战争小说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表面上, 比尔斯毫无保留地揭示战争的罪恶, 讥讽人类文明的缺陷, 嘲笑人性的弱点; 实质上, 他对人类生存状况及人类命运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1]。

不少批评家还认为比尔斯的战争小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中心人物的孤立无援, S.T. 乔系指出这些人物的孤立无援, 而且还处于一种“被迫行动的状态”“囿于一种难以忍受、无法逃脱的困境之中, 最终难逃厄运——无论死亡还是疯狂”, 此外, “他的人物还处于一个既不能向前也不能退后, 只能站在那等待死亡, 这便是典型的比尔斯的人物时刻”[4], 所以比尔斯的人物处于一个极端痛苦的状态, 他也在极力为其人物找到和解的方法, 如《空中骑士》不仅展现了战争的残酷性, 更是强调履职的重要性, 所以人物的痛苦得到了一定程度缓和, 同样, 《鹰溪桥上》也极有可能存在缓和人物痛苦之法。

国外对这部作品的研究远比国内丰富, 主要集中在技巧, 主题及文化研究。如 Logan, F.J(1977)认为《鹰溪桥上》也宽泛的暗示了生命应该是一种没有战争的方式, 以及对死亡可能方式一种想象[3]。同样, John R.Brazil (1980)从文本与语境中看比尔斯苦涩的背后, 认为比尔斯面对矛盾价值观时, 其小说主题往往是死亡, 对于生活中的大多数罪恶, 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死亡, 所以只有通过逃避生活, 他才能找到快乐和秩序[3]。而比尔斯童年时期产生了异常程度的死亡焦虑, 害怕死亡, 现在却认为死亡是生活中大多数罪恶的唯一补救之法, 这种转变的可能原因之一是其身处的时代, 宗教派别越来越强调仁慈和仁爱的上帝, 加之比尔斯身处于美国超验主义繁盛时期, 受到其影响影响, 因此便找到了死亡不仅仅是肉体

的消亡，更是灵魂的救赎。在《鹰溪桥上》中，法可尔即使无法摆脱真正的肉体消亡，也终究无法像他所幻想的那样回到家庭与妻子团聚，但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从先前的荣耀和耻辱的平民生活的执念中解脱出来了，体会到生命的宝贵[3]，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可尔在生命的最后放弃了战争是光荣的念头，懂得了生命何其宝贵，这也可以说是精神上得到了救赎，就像锤死基督徒的最后愿景。在中世纪晚期，对个人的命运日益关注，导致了“死亡艺术”的产生，这种死亡艺术在其诞生和荷马时代之间经历了各种变化，但一个人的最后时刻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救赎，这种观念在19世纪仍然很重要[5]，所以法可尔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因此，法可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进行的逃跑幻想亦是精神得到了救赎，这暗含在小说的隐性情节中，需跳出显性情节而去挖掘其背后的隐性情节才能发现。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比尔斯《鹰溪桥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造技巧及主题意义上，学术界对比尔斯的主题、人类命运的关心已有一定的涉及，但是并未提到救赎的办法，并且对《鹰溪桥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情节发展，并未拓展到情节发展背后的隐性进程。然而，在《鹰溪桥上》却存在大量琐碎离题的自然景物描写，而比尔斯的写作原则便是语言经济原则，所以这些看似与情节无关紧要的描写必然有着其自身的重要作用。从申丹的隐性进程理论角度分析及结合作家身处的时代背景和其作品的互文性，可以看出这部小说的叙事并不止步于描写战争的残酷性。为什么作品要用大量篇幅透过主人公的视角去观察如此丰富的自然景物？实际上主人公的濒死体验构成了作品的主要内容，但似乎很少有研究者关注主人公临死前视角中展现出的内容，即自然。然而，倘若我们打破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在关注显性情节的同时，将目光拓展到情节背后的一股叙事暗流，即隐性进程，则会发现《鹰溪桥上》不仅仅大量的自然景物与美国超验主义相呼应，为人类悲惨命运提供了一条超验的救赎之路，与情节发展相互补充，在张力中联手表达出更丰富的作品主题意义。

2. 超验主义与隐性进程

超验主义在欧洲活跃了半个世纪后，19世纪初期传入了美国，尽管理论源于古代和现代欧洲哲学家的学说，又受到东西方神秘主义、西欧的拿破仑主义和东方的印度教影响，但在美国却具有重要意义，影响了一代代美国作家，如霍桑、麦尔维尔、福克纳及海明威等。以爱默生为首的美国超验主义认为：上帝存在于世界之中，并非是分离的存在；人的灵魂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个人是自己行为的最好保证人；自然与人的精神彼此养育，相互反映[6]。同时，爱默生对自然的认识也上升到一个崭新的观念，他认为，自然不纯粹是物质的，不是单调、未开化、隶属于历史范畴之下、引人走向物质主义的平凡实，而是精神或上帝的象征，是有生命的，它充满了上帝的存在，自然是最纯净的，是超灵的外衣，因而能在人的身上产生使人圣洁的道德影响，对人的思想起到健康和恢复作用。当人完全沉浸在大自然中时，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他就会得到精神上的升华，进而达到完人。爱默生对自然还有另一种看法：处于人周围的世界是具有象征性的，流动的河水表明宇宙永不停歇的运动；四季与人的一生相呼应；蚂蚁，这身体微小、心脏极大、辛勤劳作的小生灵，是人本身的崇高形象的缩影。爱默生的自然主义象征的观点认为，自然中的事物带有象征的特性，物质世界象征着精神世界[7]。这与比尔斯的自然观有一定的共通之处，比尔斯对斯多葛学派有着毕生的兴趣，相信人是神性的一部分，人的灵魂是遍及宇宙伟大灵魂的一部分。“按自然生活”，则强调了对普遍规律的服从，与超验主义的回归自然有一定的联系，二者都强调回归自然。比尔斯还生活在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的超验主义时代，他相信个人能够而且应该照顾好自己事务，他是自己人生历程的决定性因素，能力和勤奋起着重要作用，比尔斯的个人神话是对个人效能的信仰。可见，身处于超验主义盛行的时代，比尔斯多多少少受到了时代及同时代作家如霍桑、惠特曼等影响[8]。这表明比尔斯的创作思想与美国超验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为《鹰溪桥上》的隐性进程

提供了可能性。

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情节的关注到当代学者对叙事进程的探讨，学术界一直聚焦于情节发展，其本身可能含有不同层次和不同分支，如沃茨(Credric Watts)提出的“隐性情节”、莫蒂默(Armine Mortimer)的第二故事、马什(Kelly A. Marsh)提出的“隐匿情节”等，这些其实都只是在情节发展的范畴内运作。而申丹发现在不少的虚构叙事作品中，在情节发展的背后还存在一股叙事暗流，这股叙事暗流并不是情节发展的一个分支，也不是情节深处的暗层，而是自成一体，构成另外一种叙事进程，自始至终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这便是“隐性进程”[6]。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在主题意义，人物塑造和审美价值上均形成对照补充或对立颠覆的关系，分析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有利于挖掘出作品更深层的含义，把握双重叙事进程则能够更全面地分析作品。如果仅仅关注情节发展，而忽略其背后的叙事暗流，就会片面理解或者误解作品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结构技巧。若要更为全面及准确地理解作品，则需要同时把握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及这双重叙事动力之间的交互作用[7]。《鹰溪桥上》在情节发展中，主人公法可尔在被处绞刑时，幻想着逃跑了，经历千辛万苦回到家与妻子团聚，可在最后却被打了一枪，接着等待他的就是死亡。从显性进程看，这是在控诉着战争的残酷，而在隐性进程中，主人公虽然肉体消亡了，但精神却得到了救赎。因此，挖掘《鹰溪桥上》显性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把握好一明一暗这两条叙事暗流，有助于丰富作品的主题意义。《鹰溪桥上》中出现了大篇幅的自然景物描写，这与爱默生的自然观有何关系？究竟暗含了什么样的隐性进程？

3. 前部分的隐性进程

《鹰溪桥上》的前部分主要交代了法可尔的现状、行刑现场、行刑细节及犯事缘由。文中的开头部分出现了一些自然的景物，如森林、河流、树干、溪水、太阳、雾气，这些自然景物扰乱了法可尔的思绪。同时，这部分也暗含了法可尔对待死亡的态度。“当宣告它的来临之时，必须以合乎条理的举动来迎接，以示对它的尊重，即便那些对它并不陌生的军人也要如此”[7]，这在情节发展中看似无关紧要，但在隐性进程却很重要，作者把死亡拟人化，让死亡变得不那么恐怖，为这部小说的隐性进程提供了可能性。接着，法可尔与自然的联系出现了。“那朝日下面的水辉，远处河岸便徘徊的迷雾，那些堡垒，那些士兵还有那块漂流的木块——这一切把他的注意力分散了”[9]，在情节发展中，这句话描写了行刑现场的周围环境，迷雾、木块这些为法可尔的逃跑提供了条件，使得他能够成功逃跑。然而，这在隐性进程中却是法可尔开始受到了自然景物的干扰，分散了注意力。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并列而行，丰富作品的主题意义。接着，“他睁开眼睛，又看到了他身下的流水，‘如果我能把双手挣脱，他心里这样想，我就能摆脱颈上的绳索，跳进河里去’。然后潜到水下躲避那些子弹，游得很用力，拼命地游到岸边，钻进那里的森林就可以跑回家了”[10]。这一段在情节发展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展现了法可尔的逃跑计划，一切看似合情合理，增加了读者对其信任，促进了情节的发展，然而对情节发展显得不那么重要的自然景物却暗含了隐性进程，河水开始分散了法可尔的注意力，睁开了眼又看到水，水本是自然之物，在《圣经》中，水的其中一个重要意象便是洗礼与新生，水不仅能够创造与毁灭生命，还可以清洁人的肉体与灵魂。洗礼作为基督教的一个重要仪式，代表着旧生命的结束，新生命的开始，受洗礼代表着对过去罪恶的忏悔，接着以水洗去自身的罪孽，然后得到重生，获得身心的纯净[9]。水在基督教仪式中，不仅是自然存在的物质，可以洗净衣物和身体上的尘垢，更是被赋予了神意，担当着洗净人们灵魂中的污垢和原罪的职责，因此水不仅能为人们带来生命的希望，洗刷掉的也不止是世间的尘土，更是让人远离尘世，获得超脱[11]。作为一名奴隶主，法可尔的手上无疑是沾满了罪孽，水对于他来说不仅可以洗掉其犯下的罪孽，更是给他带来了希望。水在这里的作用与美国超验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作为自然意象，水能在人的身上产生使人圣洁的道德影响，对人的思想起到健康和恢复作用。因此，法可尔由水想到了逃跑计划，可

见水给予了他希望和帮助，拯救他于危险之中。与水紧密相连，法可尔与自然的联系愈发紧密，自然对其的影响也在加大。

总之，对情节发展而言，第一部分主要描写了主人公周围的环境及详细的行刑方法，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叙述者，让读者相信并跟着叙述者的叙述走，然后开始同情法可尔，却隐藏了对自然的重视和强调自然影响的超验主义。

4. 后部分的隐性进程

结尾部分主要描写了法可尔的逃跑过程的艰辛和最终难逃死亡的结局，最后叙述者让我们从法可尔的幻想中回到了现实，原来这一切都是法可尔在被处绞刑时的刹那间所幻想的逃跑。这一部分的描写出现的自然景物是最多的，看着对情节发展作用不大，却对本文隐性进程的发展极为重要。在第三部分的第一段中：

当佩顿·法可尔从桥上径直地向下坠落时，他已经没有了意识，就像是死了一样……突然随着“啪”的一声响，环绕在他身边的光迅速地向上升起……他的思考的能力恢复了……他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他上方的一道亮光……他的身子还在下沉，那道光变得越来越微弱，直到化作一丝的存在[8]。接着，光又开始变亮，越来越亮，他知道自己在往水面上浮……¹

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法可尔从桥上掉了下去，失去了知觉，接着被包围在一片阴亮的云里，突然间周围的灯光随着水花飞溅的声音亮了起来，伴随着光的出现，他的思想力量恢复了，然后他在黑暗中睁开眼睛，看到了头顶上有一道亮光，接着光线越来越弱，直到有微弱的微光，接着光又变得越来越亮。伴随着光的出现，法可尔的思想力量恢复了，也是在光的影响下，法可尔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处境。在情节发展中这段是描写法可尔逃跑过程的艰辛，然而在隐形进程中却暗含了自然对人的治愈，给人希望：自然物的出现使得法可尔的思想力量恢复了，也是在自然的提醒下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光，在《圣经》里是作为上帝的象征，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同时也是圣灵的象征。法可尔与光的接触象征着其与上帝的交流，暗含了超验主义。此外，在基督教绘画中，圣徒因“蜕变”而皈依的主题也是靠光来实现的，因此，光还具有重生的意义[12]。光给与了法可尔恢复的能力，让其感官能力得到恢复，甚至比之前更加敏锐，助其“重生”。

在结尾部分的第二三段中：……他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已经浮出了水面，眩目的阳光使得他睁不开眼……此时，他已经完全又有了身体的感觉……这是他之前从未有过的感受。他感觉到自己的脸碰到水纹，听到不同的水纹拍在他的面部所发出的声音。他看到了河岸上的那片森林，看到了一棵棵树木，一片片叶子，甚至能看到叶片上的经脉，包括上面的那些昆虫：蝗虫、绿头蝇……²

阳光看似照瞎了法可尔的眼睛，实则治愈了他，使得他此刻完全恢复了身体的感觉，而且还变得比以往更加敏锐，能感觉到以往从未感觉到的事情，如能感觉到脸上泛起的涟漪，听到它们撞击的不同声音，更能看到河岸上的森林，看到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叶子上面的昆虫、蝗虫、苍蝇等。前面部分自然治愈了法可尔，法可尔开始感觉到了自然，到了这里，他逐渐融入了自然。这一段在情节发展中主要是描写了法可尔的感官变得异常敏捷，超乎常人，甚至不正常，使得读者开始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但在之前可靠叙述者的影响下，即使怀疑但是读者依旧信以为真了，但是在隐性进程中，异常敏捷的五官却有重要作用。伴随着阳光的出现，法可尔恢复了身体的感觉，还变得比之前更加敏锐，这些在情节发展中看似不重要的细节却一步一步地对隐性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得隐性进程逐渐显露出超验主义，光的出现使得法可尔的思想和身体的力量都恢复了，并且变得更加敏捷，能听到、看到、感受到大自然，

¹安布罗斯·比尔斯《鹰溪桥上》，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²安布罗斯·比尔斯《鹰溪桥上》，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从意识到自然逐渐地融入了自然，进而与上帝进行交流。情节发展中，感官力量异常敏锐，让人怀疑其故事的真实性，而在隐性进程中，异常敏锐的感官是自然对法可尔的影响，目的是让其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大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这一明一暗的叙事进程，使得该作品充满了张力，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

在结尾的后半部分中：……

水面、河岸、树林……没过一会儿，他就被水流抛到了左岸边的一堆砾石堆上……突然一阵刺痛让他注意到自己的一只手被砾石划破，使他恢复了意识……那一捧捧沙就像是钻石、宝玉、翡翠一般，他再也想不出什么美好的东西与它相比……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逃到这样美好的地方来，真想一直待在这迷人的树林里……³

上面的文段中也出现了许多的自然景物：水、森林、花园植物、光、星星。一种奇怪的、玫瑰色的光透过树干间的空隙照进来，风在树枝上吹出了悠扬的竖琴声。他现在不想完善逃跑计划，只想待在那个迷人的地方，直到重新被占领为止。这一段在显性情节中主要是叙述法可尔的逃跑经历，逃到了一处鲜少有人迹的森林，但是在隐性进程中却是法可尔与自然的进一步融入。伴随着水的影响，法可尔的意识恢复了，此时，在自然的影响下，法可尔的思想、身体、意识的力量都得以恢复了，法可尔对自然也从感受到融入再到现在的迷恋，这似乎也暗示了自然在一步一步地引导法可尔走向一条鲜少有人迹的道路。接着，他一头扎进森林里，在太阳的照耀下旅行，道路似乎人迹罕至，当他从树林的裂缝往上看时，头顶上闪耀着巨大花园中的星星，组成了奇怪的星座，然后他清楚的听到一种陌生的声音在低语，这部分在情节发展中主要是突出法可尔逃跑遇到的苦难，可在隐性进程中却是法可尔在自然的带路下，来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星星、星座乃是天上之物，更加暗示了他所迷恋的此处便是天堂，上帝所在之地，自然则是上帝的象征，这蕴含了美国超验主义的思想，自然披上了上帝，超灵的外衣，与人直接进行交流。

在最后部分，在早晨的阳光下，法可尔回到了家，正准备与妻子拥抱时，四周亮起了一道炫目的白光[13]。最后部分在情节发展的作用主要是叙述者向我们交代法可尔已经死了事实，前面的逃跑原来都是幻想，叙述者把读者拉回了现实，展现出了战争的残酷性。然而，这里出现的早晨的阳光以及法可尔死时周围的白光看似对情节的发展无关紧要，但在隐性进程却十分重要，前文中，伴随着光的出现，法可尔的思想、身体、意识都恢复了，可见光是治愈法可尔的，具有“重生”的作用，但是在最后结尾光的出现，结果却是法可尔的死亡，其实不然，在隐性进程中，法可尔虽然肉体消亡了，但精神上却得到了救赎，所以光依旧是治愈法可尔的。在死亡的最后一刻，法可尔回到了自己最想回的地方，并伴随着一道白光，与自然融为一体，完成了救赎与上帝的统一。所以，这看似对情节无关紧要的细节，却是暗含了法可尔肉体消亡，灵魂却得到了救赎，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隐性进程。显性进程与隐性进程并列前行，一明一暗，共同丰富作品的主题的意义。战争虽然会给人带来巨大灾难，但比尔斯通过法可尔法可尔在死亡最后一刻得到的救赎，暗示了在战争中，人类的肉体虽然消亡了，但是精神上却得到了救赎[14]。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短短的一篇小说却出现了十多次眼睛的字眼，在提倡语言经济原则比尔斯作品中，为什么眼睛会出现这么多次呢？仅从情节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很难解释的，如果能从超验主义的隐性进程角度重新审视文本的细节，那么问题则会迎刃而解，法可尔通过融入自然，研究化身艾默生所说的“透明的眼球”，在接近“超灵”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赎，“他透过水，看到那个哨兵的眼睛正透过步枪的瞄准镜盯着他现在的方位。那是一只灰褐色的眼睛，目光很锋利，是所有有名的那些狙击手们所拥有的目光”。其实，这双眼睛便是法可尔自己的，透过这双眼睛，法可尔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事物，异

³安布罗斯·比尔斯《鹰溪桥上》，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3页。

常的敏锐，与自然融为一体，完成与上帝的同一，进而达到完人。艾默生在论自然中提到过著名的“一个透明眼球”的比喻，即当人成为“一个透明的眼球”，当个体的肉身消亡时，自然与个体完全交融，人的灵魂也摆脱了肉体的桎梏，融合并成为超灵的一部分[9]。法可尔正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不断通过想象发挥着“透明的眼球”功能，变得异常地敏锐，融入了自然，与其融合并成为超灵的一部分，完成了灵魂的救赎。通过描写大篇幅的自然景物与“眼球”，比尔斯让《鹰溪桥上》暗含了以爱默生为主导的美国超验主义的隐性进程。因此，从情节发展来看，《鹰溪桥上》表现了战争的残酷性及比尔斯的反战主题，然而，从隐性进程看，比尔斯巧妙地运用自然和眼睛，让这部小说暗含了超验主义的隐性进程，为在战争时期人类命运的重新安排提供了超验主义的救赎之路[15]。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云南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KC-23234656 资助。

参考文献

- [1] 陈海蛟. “辛辣”的毕尔斯—安布鲁斯·毕尔斯(Ambrose Bierce)生平及其作品简介[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6): 89-91.
- [2] 甘建刚. 毕尔士战争小说的主题与艺术特色[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2): 50-55.
- [3] 李公昭. 安布罗斯·比尔斯的战争观[J]. 外国文学, 1998(6): 55-58.
- [4] 刘国旭. 基督教美术中“光”的象征意义探究[J].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 2015, 33(2): 106-114.
- [5] 唐姬霞, 廖桂湘, 袁松荣. 跨越百年的国内外安布罗斯·比尔斯研究综述[J].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 2015, 20(1): 104-109.
- [6] 申丹. 双重叙事进程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3.
- [7] 申丹. 反战主题背后的履职重要性——比尔斯《空中骑士》的双重叙事运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2(3): 165-173.
- [8] 周楚汉. 时代冲突背后的超验主义——菲茨杰拉德《赦罪》中的隐性叙事进程[J]. 外国文学研究, 2022, 44(5): 90-102.
- [9] 王延娥, 陈海蛟. 一场没有英雄的战斗——评安布罗斯·比尔斯战争小说的反讽叙事艺术[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2, 20(2): 80-83.
- [10] 王屹. 爱默生超验主义对美国文学的影响[J]. 外语教学, 1997(3): 59-65, 82.
- [11] 杨利芳. 《诗经》与《圣经》中水意象的对比[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18, 2(18): 35-37.
- [12] 张辉. 试论宗教仪式中水的象征意义[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0(2): 31-33.
- [13] 张素艳. 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对美国文化的影响[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3): 68-71.
- [14] Brazil, J.R. (1980) Behind the Bitterness: Ambrose Bierce in Text and Context.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1870-1910*, 13, 225-237.
- [15] Colbert, C. (2003) Winslow Homer, Reluctant Modern. *Winterthur Portfolio*, 38, 37-55. <https://doi.org/10.1086/382161>